



宋代狮钮𬭚于见证泾川西王母文化活动

□ 顾海丽

宋代狮钮𬭚于 �泾川县博物馆藏

西王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之一,其文化源头可追溯至遥远的上古时期,历经数千年岁月流转而传承不绝。甘肃泾川,作为西王母文化公认的发祥地,境内的王母宫始建于西汉,此后历代均有修葺,其中又以宋代最为兴盛,由此形成了延续千年的西王母文化,成为当地文化传统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5年,在泾川王母宫山顶出土的宋代狮钮𬭚于,为后人研究宋代泾川西王母文化活动的风貌以及当时乐器发展的脉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佐证。

𬭚于,是我国古代军队中常用的铜制打击乐器。其形制多为青铜质地,呈圆筒状,上大下小,顶部通常设有便于悬挂的钮,常见的有环钮、桥钮,或是雕琢成虎形、马形、龙形等动物造型,使用时以绳索悬挂在横梁上敲击即可发声。随着时代变迁,𬭚于的功能逐渐拓展,从军中乐器演变为重要的祭祀乐器。由于顶部的钮具有鲜明的辨识性,因此𬭚于通常以钮的外形来命名。

泾川宋代狮钮𬭚于的发现

这件宋代狮钮𬭚于是在1995年重修泾川王母宫山顶的庙宇时,在施工现场无意间发现,现藏于泾川县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器物整体保存完好,为一件青铜乐器,根据考古发现,是甘肃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𬭚于。

该𬭚于通高99.8厘米,口径48.6厘米,整体造型为平底葫芦形,中空,下口平,圆肩出宽沿,束颈,鼓腹。顶上有狮纽,狮子昂首挺胸,双耳竖立,粗眉凸目,双唇紧闭,四肢粗壮有力,脑后螺饰,长尾后拖。造型生动写实,线条流畅有力,既展现了宋代工匠精湛的技艺,也暗示了它在祭祀活动中不一般的地位。

这件狮钮𬭚于经甘肃省文物局专家委员会鉴定为宋代,笔者从𬭚于的狮纽形象与宋代出土的狮子形象进行比对,狮子整体形象较为温驯,肩膀与四肢处的羽翼卷曲向上,形象似简化的火焰纹,羽翼的刻画线条符合宋代狮子羽翼的变化规律,与宋代永昌陵南门石狮、永裕陵石狮等宋代石狮风格极为相似。

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击鼓、吹角、鸣金、𬭚于等用于指挥军队进退。我国古代有“击鼓鸣金”之说,击鼓为部队向前冲锋,鸣金则为部队向后撤退。《淮南子·兵略训》有“两军相当,𬭚鼓相望”的记载。《国语·晋语五》:“战以𬭚于,丁宁,儆其民也。”韦昭注:“𬭚于,形如碓头,与鼓角相和。”这些文献资料向我们展示了𬭚于作为军中乐器的使用情况。

𬭚于除作为军事用途外,也常用于宴乐、祭祀。《周礼正义》中有“金𬭚于亦以和乐”的记载。考古资料显示,𬭚于和鼓、编钟等乐器一起出土,说明𬭚于有配合奏乐的功能。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1件贮贝器上,有𬭚于和铜鼓敲击的场面,𬭚于和铜鼓悬在双柱架上,用于组合敲打使用。说明𬭚于常与鼓、编钟等其他乐器配合,做祭祀、宴饮乐器使用。这件狮钮𬭚于的形制与尺寸适合悬挂敲击,器壁厚度均匀,用手敲击时可发出浑厚悠长的声响,适合在祭祀仪式中配合鼓乐使用,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

狮钮𬭚于与泾川西王母文化活动

泾川西王母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血脉及民俗基因。西王母神话的传说至今还流传于民间,泾川西王母文化活动从何时兴起?除了传说故事之外,还有一些文学经典、碑刻文献可供探究。唐代诗人李商隐《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生动描述了周穆王、汉武帝拜谒西王母的故事。《史记·匈奴列传》: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四十万骑入朝、萧何,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官,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文献中有记载回中官,而非“王母宫”或“王母祠”,所以并不能够说明泾川西王母文化活动兴起的时间。直到宋代陶谷撰的《重修回山王母宫碑并序》碑发现后,泾川王母宫有了最早的重修记录,此碑也是泾川王母宫有记载的最早关键碑刻。碑文开宗明义引《礼记》“法施于人则祀之”,学者邢莉教授在《泾川西王母文化调查研究》第二章“泾川西王母宫的历史渊源”对此有解读,认为“宋代西王母祭祀已列入国家正祀之中”,碑文“位冠上宫,福流下土,则回中有王母之庙,非不经也”,推测了回中王母宫的存在。《太平寰宇记》是宋代权威的地理志书,其载:“西王母祠,周地图记云,王母乘五色云降于汉武,其后帝巡郡国,望彩云以祠之,而五色屡见于此。《汉书》上之□□□,因立祠焉。每水旱,百姓祷祈,时有验焉。”文献没有“《汉书》上之□□□”,但此缺处却是立西王母祠的原因,《汉书》上之“□□□”为有,待考。但可以确信的是宋代《太平寰宇记》对泾州之“西王母祠”有记载。从上述文献分析,可推断泾川至少在宋代已经有了西王母祠的存在,同时再结合陶谷碑中的“法施于人则祀之”的记载,可以推断泾川



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敲击𬭚于和鼓的图像。

至少在宋代已经开始举办有关西王母文化的祭祀活动。

从狮纽形象来看,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狮子被作为贡品送到中原地区,狮子的形象就在中国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狮子一直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百兽之王”,具有镇邪驱祟、守护神灵的寓意。在汉代部分墓葬中出现的镇墓兽形象,以较大猫科动物的头部及鬃毛的出现,代表狮子作为纹饰的装饰已在中原出现并逐渐被人们接受,将狮子作为𬭚于的纽饰,符合西王母“万神之母”的尊贵地位,也体现了祭祀活动中对神灵的敬畏之心。从功能意义来看,古代𬭚于的演奏用途及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杠杆击打,一种是用手拍打。杠杆击打用于军事方面,战争时用作号令,用手拍打则是为歌舞伴奏。《南齐书·卷三十五·始兴简王鑑》载:“广汉什邡人段祖以𬭚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圆如筒,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悬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跳注𬭚于,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说的是广汉什邡人以𬭚于献王,并简单描述其形制,用手拍打,清响良久乃绝。𬭚于在祭祀活动中,用手拍打为祭祀歌舞伴奏,是一种可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青铜乐器。泾川出土的这件宋代狮钮𬭚于应为西王母文化活动中重要的重要乐器之一,配合鼓、钲等乐器一起使用,悬挂于木架之上,用手拍打,发出浑厚的声音。

空间上,这件宋狮钮𬭚于出土于泾川王母宫山顶,刚好为宋代西王母祭祀活动的核心区域,其使用功能应与西王母祭祀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时间上,𬭚于的年代与西王母文化活动在宋代记载时间相吻合。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契合,使得这件宋狮钮𬭚于成为研究宋代西王母文化活动的重要文物,是宋代泾川西王母文化活动的重要见证。

西王母文化活动的传承

宋代奠定的西王母文化活动传统,在元明清三个时期的传承发展中,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这一延续性能从历史遗存中得到清晰印证。泾川现存的元《重修王母宫记》碑、明《重修王母宫记》碑、清《共成善果》册以及民国时期《重修泾川王母宫正殿记》碑等珍贵史料,均明确记载了王母宫历经各代修葺的历程,且这些修缮活动均由官方主导,这一细节说明西王母文化活动在当时并非单纯的民间行为。

《泾州志》中收录的曾士毅《谒王母宫》一诗,以“王母山上宫观巍,雨中行径草芬菲”的诗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画面,雨中山间的小径旁草木芬芳,而王母宫的宫观

在雨雾中更显巍峨壮丽,直观展现了当年王母宫的盛景。泾川县博物馆珍藏的清代《共成善果》册中,详细地描绘了王母宫山108座宫观庙宇的全貌。那些鳞次栉比的庙宇群,不仅是建筑艺术的体现,更直接反映出清代泾川王母宫民众云集的热闹场景。

近代以来,即便历经多次社会变革的浪潮,泾川西王母文化活动的核心内涵却始终未变,依旧坚守着其文化根脉。自1992年王母宫启动重新修缮工程以来,这一承载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地标逐渐焕发新生。2008年,“西王母庙会俗信”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其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这一传统活动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意义。

如今的泾川西王母文化活动,在传承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它既保留了宋代流传至今的祭祀,让古老的文化活动得以延续;又巧妙融入了文化论坛、民俗展览、商贸往来等现代元素,使这一传统活动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传统与当代的有机融合,不仅让西王母文化在新时代得到了更好的传播与弘扬,也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纽带。

泾川县博物馆珍藏的宋代狮钮𬭚于,是甘肃地区极为罕见的宋代祭祀乐器,更是宋代西王母文化活动留下的重要实物见证。从宋代至今,泾川西王母文化活动历经千年岁月洗礼而延绵不绝,其生生不息的传承过程,深刻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延续性。

(作者单位:泾川县博物馆)



清《共成善果》册描绘了清代王母宫108座庙宇楼阁。泾川县博物馆藏

【延伸阅读】

泾川王母宫石窟

□ 刘小雷

王母宫石窟,位于甘肃平凉市泾川县西郊,汭河和泾河交汇处的宫山脚下。王母宫石窟又名大佛洞或千佛洞,是陇东地区年代较早、较大型的一个中心柱式佛窟。它没有开窟的明确纪年,不过据专家从造像风格推断,其应早于创建于北魏永平年间的南、北石窟寺的七佛窟。从造像风格的演变上来看,王母宫石窟塑像已具有“褒衣博带”的某些特点。2006年,王母宫石窟被评为国家文保单位。

【一】

距离泾川县城不到1公里处的城西大桥上就可以看到“泾渭分明”的奇观——在一座如巨舰劈波急进的山峦前,从左侧的川道上流过来的泾河支流汭河和右侧远道而来的泾河在山前的浅滩上汇合在一起,奇特的是它们在交汇的地方有明显的分界,左侧的水色清亮,右侧的水浑黄。

那座气势雄奇的山就叫回山或回中山,当地人叫它“王母山”,大名鼎鼎的王母宫就在山上,王母宫石窟却坐落在王母山北面的山脚。

王母宫石窟依崖建造,三层,凌云飞阁。进入到石窟里,看到石窟完全是依山开凿,略呈长方形,石窟坐西面东,高11米,宽12.6米,深13米,中心柱宽7米,深7.6米。回廊形状有点像“回”字的笔画。

石窟内造像分三层,中有方体塔

柱,直连窟顶。中心塔柱四面和窟内三壁分三层雕有大小造像二百余尊。

第一层造像是释迦牟尼像、药师三尊变像、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像和一佛二菩萨像,以及北魏时期的精美浮雕。

第三层的建造物接近石窟顶部,有风化侵蚀所形成的锈色,表面发白,且有状似根须又似流质自内淌出的“石筋”锈痕,北魏风格十分明显。

中心柱正面塑造的一尊高约4米唐代风格的佛像,泥塑石胎,身材比例匀称,体态自然舒展,丰腴饱满,其姿态之优美,神态之恬静,结构之准确,手法之简洁,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塔柱上四角都有白象驮宝塔的雕像是,北魏石雕的精品。

白象在古印度被认为是十分吉祥的动物,在佛教中被赋予更深的寓意,白色表示没有沾染世间杂尘,象则象

征的法身能够负担重荷。工匠将白象的头部夸大,双耳也略有夸张,四肢显得更加短粗,造型极为可爱……

王母宫石窟开凿时期没有明确记载,但有学者推论它要比陇东石窟群里的南、北石窟还早,应该创建于北魏太和末或景明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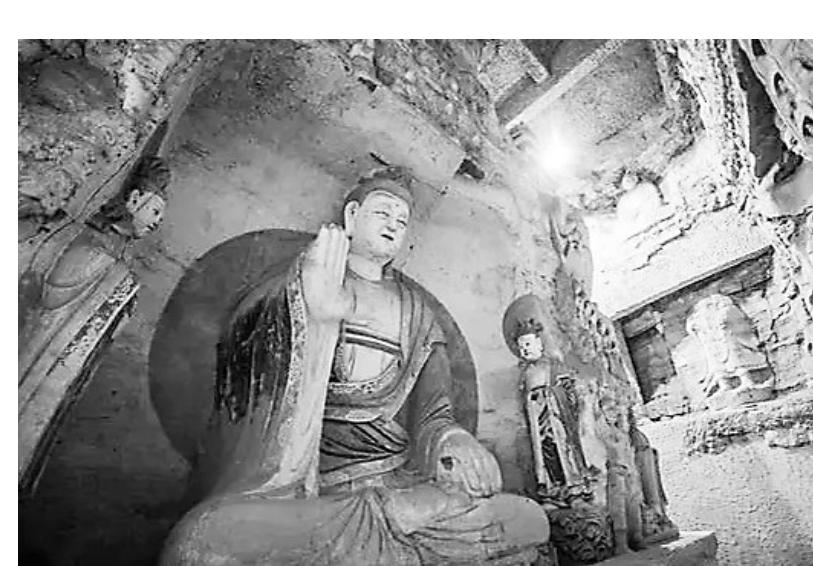
【二】

学术界何以有此推论?

时光还要回溯到约百年前的一次学术考察。

1924年,北大教授陈万里陪同国学者华尔纳考察泾川县王母宫及南石窟寺。因为王母宫石窟内的中心塔柱上部四角各雕一大象驮塔,华尔纳称之为“象洞”。华尔纳的学术考察报告《在中國漫长的古道上》1926年在美国出版,王母宫石窟声名远播。

陈万里陪同华尔纳考察王母宫石



王母宫石窟(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窟时,他敏锐地发现泾川王母宫石窟的造像风格和远在大同的云冈石窟十分相近。

王母宫石窟和云冈石窟之间会有着怎样神秘的联系呢?

北魏时期,笃信佛教的统治者兴建石窟,从公元453年起,在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云冈石窟开始

了历时数十年的修建。

据载,云冈石窟的开凿动用了5万

名工匠。

由此,陈万里先生推测其中一部分技艺精良的工匠极有可能后来奔赴泾川,开凿修建了王母宫石窟。

王母宫石窟的两尊胁侍菩萨具有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典型特征,便是

最好的佐证。有学者根据北宋赵明诚所撰《金石录》的题跋部分有“后魏化政寺石窟铭”一条,推断开凿者正是北魏太和末年泾州刺史抱嶷。

【三】

抱嶷担任泾州刺史之前,曾是权倾朝野的宦官。他本就是泾州人,得到执掌政权的冯太后信任。冯太后笃信佛教,特派抱嶷等先后负责开凿云冈石窟。

冯太后去世后,抱嶷衣锦还乡,担任泾州刺史,赐爵安定公。

当时泾州辖六郡十七县,包括今天的甘肃陇东、宁夏大部分和陕西西北部地区,是北魏王朝布设的西北重镇。

抱嶷回到泾州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凿化政寺石窟。从石窟的设计到开凿,抱嶷通过多方联系,聘请当时因建造云冈石窟而名噪一时的众工匠长途跋涉,专门到泾州开凿。因而在石窟建成后,人们发现,化政寺石窟正是皇家开凿的云冈石窟第六窟的“优化升级版”。

抱嶷利用皇家的审美标准和御用工匠,给泾州留下了历史上陇东地区开凿时间最早的一座佛教雕塑艺术宝库。

或许是回山之上的王母宫实在太有名了,久而久之,山脚之下的化政寺石窟之名逐渐湮没,被后世称为王母宫石窟。